

文章编号: 1673-1646(2017)01-0014-06

论唐代诗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

韩 达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由于诗人本身的志趣不同, 唐代诗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态度, 一种是赞赏其隐逸出世的独立精神, 另一种则不满于其远祸避世的消极姿态。而不同时期的文人则根据时代背景和个人境遇的不同扬弃式地接受陶渊明的影响, 这使得唐代的陶渊明接受史呈现出强烈的个体差异性特征。本文通过梳理唐人诗文中的陶渊明形象, 揭示这种褒贬共存的复杂感情背后“仕与隐”的深层矛盾, 并从类书对于陶渊明的征引情况入手, 探讨唐人对于陶渊明普遍理解不深的弊病及其原因。

关键词: 陶渊明; 唐代; 接受史; 吏隐观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1.003

On the Reception of Tao Yuanming of Tang Poets

HAN Da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interests of the Tang poets, the reception of Tao Yuanming in Tang dynasty presents two different ways. One side admires Tao's independent spirit of seclusion, the other discontents his negative attitude. The literati of different periods accept Tao's effect in a sublation way according to the times background and personal conditions, which lead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individual difference of reception history of Tao Yuanming in Tang dynasty. By carding the images of Tao Yuanming in poems and articles of Tang people, the paper reveals the deep contradiction of "official and seclusion" hiding in the complex feelings of appraisal. And by carding the quotations of Tao Yuanming in encyclopedia,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malady and reason why Tang people universally lack understanding of Tao Yuanming.

Key words: Tao Yuanming; Tang dynasty; reception history; the ideas of official and seclusion

唐代诗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由于诗人本身的志趣不同,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态度, 一是赞赏其隐逸出世的独立精神, 另一种则不满于其远祸避世的消极姿态。从时代分期的角度来看, 初盛唐诗人往往对陶渊明颇有微词, 而中晚唐诗人则逐渐表现出与陶渊明的契合之感。但这种演变倾向并非绝对, 诗人本身也存在顺境逆境的情况, 故而他们在各个阶段对陶诗的感受自有不同。唐人对陶渊明怀着一种褒贬共存的复杂感情, 陶诗在唐人笔下也多作为单纯的典故使用, 似乎并未真正地与其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这种情况可能与陶渊明开创田园诗以来, 南北朝几无嗣响有关。由于前人继承陶诗的精神旨趣

和写作风格的成果较少, 造成唐人对陶渊明的接受处于逐渐探索的局面, 这构成了唐代陶渊明接受史中较为奇特的现象。

1 隋至初唐: 以隐逸诗人为主

陶渊明的诗文在南北朝时期并无多大的影响, 随着南北文化融合的加深, 隋代人通过学习《文选》而了解陶渊明。但他们仅将其视为避世隐居的高士, 对陶诗的借鉴也停留在“怀乡”等浅层含义, 驻留于山野之际或怀乡心切之时才会触发他们引用陶渊明的诗情。由南朝入隋的江总曾在《于长安归还

* 收稿日期: 2016-08-12

作者简介: 韩 达(1986-), 男, 博士生, 从事专业: 魏晋隋唐文学。

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中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1]2595}指代思归之情，含蓄蕴藉而不失典雅。卢思道的《听鸣蝉篇》亦用陶诗之“归去来”表达对故乡的眷恋，更隐含着他对仕路艰险、宠辱遽变的忧惧。这两首已是对陶诗理解较好的作品了，而隋代其他诗人对陶诗的理解则滞于浅表的层面。孔德绍的游览之作《登白马山护明寺诗》在结尾用“桃源失途”显示山深幽泌。孙万寿的《别赠诗》仅取陶渊明饮酒的典故而已。李巨仁的《登山篇》视陶渊明确为抽簪脱屣避居深山的隐士，杨暕的《与逸人王真书》云“彭泽遗荣，先有《归来》之作”^{[2]405}也是同样的用意。隋唐之际的刘孝孙、诸葛颖、薛道衡等人对陶诗都有或多或少的接受，但总体上并未超出上述接受范式的范围。

作为初唐最重要的隐逸诗人，王绩在诗歌中屡次引用陶诗，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来自史传所载，更能理解陶渊明的独立精神。他在《北山赋》中说：

昔蒋元翊之三径，陶渊明之五柳。君平坐卜于市门，子真躬耕于谷口。或托闾闾，或潜山藪。咸遂性而同乐，岂违方而列守。余亦无求，斯焉独游。

可以看出，王绩心目中的陶渊明是一位具有自由天性而无所拘束的人物，这与其本人的追求相符合。他认为身处市廛抑或投迹山藪，只要随性适心皆可达到同乐独游的境界。这远比隋代诗人动辄以“山林渊岳”代表陶潜深刻，更能把握陶渊明诗文中所蕴含的“真意”。但其兄王通对陶渊明甚为反感，认为陶渊明这样的“放人”无益于国家，并为此批评过王绩：“汝忘天下乎？纵心败矩，吾不与也。”^{[3]92}王通继承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而王绩的济世之心多来自其兄的教导，二人都曾有西游长安求宦失败的经历，对此王通可以忍耐以待变，王绩却深刻地认识到尘网缠缚的真相，他仿照陶潜所写的《五斗先生传》正是放弃“终南捷径”后的感慨之作。王绩追慕陶诗的内在精神，即追求高蹈独立的人格并与俗世政争保持距离。他并非无意于政治而是难遇清明的时代，如《晚年叙志示翟处士》《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等诗描述其早年雄心及经历丧乱后回归淳朴自然的心迹。他在《醉后口号》中将陶潜与阮籍并列，更是个人自况。这种以归隐为仕进的观念影响了此后的诗人，王绩发掘出陶渊明隐逸者形象背后“志不获聘”的无奈，为唐人接受陶渊明开启了新的角度，使山水田园成为诗人排遣愤懑和重寻自由的家园，使他们或为官或隐居都保持着精神的独立。

王绩之后，初唐四杰接续起对陶渊明的接受，他们的焦点集中于陶渊明如何处理现实政务与独立个性间的矛盾。王勃对陶渊明稍有微词，他认为“昔者陶潜彭泽，罔闻仁慈之风”^{[4]556}，即陶渊明作为地方官来说是不合格的，但他尊陶渊明确为“自得高人”，可以在精神上解决仕与隐的矛盾。在杨炯的笔下，“陶元亮摄官于彭泽，道契羲皇”^{[5]128}，“是以德成者上，道在斯尊，陶潜则安枕北窗，言偃则鸣弦东武”^{[5]106}。所谓的“道契羲皇”与“安枕北窗”体现了身在官场而放任自达的态度，他认为陶渊明的政治理想是上古时无为而治的为政之道，这就回答了王勃的质疑，也为入仕者提供了一条萧散任事并可随意出入官场的精神出路。

唐人由此得以借助陶渊明来处理官员的吏隐观，当有辞官者出现时，长官甚至以陶渊明为例来决定如何处理这些下属。杨慎矜、张鼎、汜云将、窦羣、常无欲的《对吏脱帻判》是一桩司法案件的判词，一名小吏因难以忍受繁重的政务而脱帻(辞官)而去。州郡的官员认为他违反了唐律中“不应为”条例，但这五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引陶渊明为例支持这位官吏的辞官行动，杨慎矜将其比作“陶潜屈身，系在彭泽”^{[6]3574}，张鼎以“田园燕坐，知陶潜之罢职”^{[6]3700}形容他辞官的正当性，窦羣认为其继承了“陶潜之美志”^{[6]4063}。

初唐四杰中较为特殊的是卢照邻，他对陶潜的关注较其他三人更有个人特色。卢照邻提到陶渊明的诗文共有三首：《杨明府过访诗序》感谢杨炯来探访卧病山中的自己；《三月曲水宴得尊字诗》仙气飘渺，陶渊明因桃源而化身为尘世的神仙，出世与“雅道”并存，是作者独出胸臆的变化；而《于时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赠柳九陇》将九陇县令柳大易比作陶渊明，又强调了“意气托神仙”^{[5]114}。这些描写皆与他求仙访道疗愈风疾的人生经历切合。卢照邻不像王勃、杨炯那样关注吏隐的问题，而是从死生超脱的角度去思考人生，其笔下的陶潜已不单单是解决仕或隐问题的世间人，而是飘然物外与世无争的仙人形象了。同时卢照邻在创作中并不偏于思想的阐发，他继承六朝山水的写法，并将其与田园结合，开拓了陶诗的表现维度。

2 盛唐诗坛：不同境遇下的陶渊明形象

以王维、李白、杜甫等诗人为代表的盛唐诗坛对如何接受陶渊明有新的认识，且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感情，这与各人所处的人生境遇有关。首先，王

维、李白、杜甫等人都对陶渊明的避世选择和襟怀抱负皆有所贬抑。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一文中嘲笑陶渊明的乞食,更将其归隐视为“忘大守小”的短视之举: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

李白亦曾讥讽陶渊明,认为他不足效仿:“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7]994}杜甫曾通观陶渊明诗集,应是非常理解陶渊明思想轨迹变化的诗人,但他也作《遣兴五首》认为他“未必能达道”^{[8]1381}。王维、李白、杜甫等人后半生命途不遂,常怀山水田园之思,何至于共同发出这样的讥刺之语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们诗文中的观点与本人出身和当时遭际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的批评来自于对个人实际生活的反思。王维的《与魏居士书》为劝魏居士出仕而作,是其晚年的手笔。他的劝说方式不单从儒家“济世”的理想出发,而且以儒释道三家进行阐述。王维先从佛教的“空无”着眼,认为“圣人知身不足有也……离身而返屈其身,知名空而返不避其名也”^{[9]1095},即身体虽是不足道的,但不能因为万物皆空而否定万物存在的价值,进而批驳许由、阮籍、陶潜“忘大守小”,未能了解“诸法皆空”的真意。王维的吏隐观表现为道家“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随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随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9]1096},即若能区别对待身与心的需求,不执着于外物,便不会为身处境所垢染,为万物所累,这是以老庄、禅宗为依据的典型“朝隐”理论。王维早年仕途得意,安史之乱后历尽艰辛,官场与人事的起伏矛盾都在其心中碰撞,迫使他去寻找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王维后期并不想出仕,但又不得不虚与委蛇,他的解决之道就是亦官亦隐,为官而心隐。所以他不赞成陶渊明式的完全归隐,因为彻底与朝事脱离难免在政治上招来极大风险,这也是他批评陶渊明的原因。

然而,陶渊明在王维的诗歌中则是另一种形象,《戏赠张五弟諲三首》(其二)中将张諲比作陶渊明:“秋风日萧索,五柳高且疎。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吾庐。岁晏同携手,只应君与予。”^{[9]200}如果王维内心否定陶渊明的话,又怎会将自己的好友比作陶潜,并且只有两人能够携手归隐呢?除此之外,王

维也颇喜欢化用陶潜的诗句,如“风景日夕佳”“夜静群动息”^{[9]430}等,《渭川田家》更是仿渊明体而作。他在《奉送六舅归陆浑》一诗中直接称赞“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9]502}。《偶然作六首》(其四)看似是写陶渊明,实际上正是诗人啸傲于淇水的写照:“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9]564}这正是诗人痛苦挣扎的内心外化为放浪形骸、纵情于酒的形象。在《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中,王维的孤独寂寞、远世避祸的心态表露无遗,他既想让朋友来看他,又怕牵连到朋友,唐人认为陶潜避世不出的原因之一是避免身仕二朝,王维因曾受伪职故而对此非常敏感,“谁解扫荆扉”一语正说明他对于陶潜晚年不愿交往的理解。

陶渊明作为田园诗的首创者,是唐代诗人无法回避的学习资源。盛唐文人通过不同的隐居方式,以顺应时代发展的审美理想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二者虽出于同源但流向不同,盛唐人没有陶潜诗的哲理思辨,也不重视理趣与景物契合的境界,但他们对于山水田园直观式的观察又使他们在状物写生上具有很高的审美水平。正如孟浩然的《口号赠王九》说的“稚子望陶潜”^{[10]1666},他们在精神思辨上确实像孩童一样,无法达到陶渊明的高度,但是往往纯真的目光才能反映出山水田园最真实、最本质的美,这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独特魅力。

早年的李白作为盛唐精神中积极进取一面的代表,自然对于陶渊明的隐逸不感兴趣。他本人也曾妄图走“终南捷径”,故而以己度人,认为陶渊明的隐逸也不过如此。陶渊明最终的抉择令他不满意,所以他说陶潜“龌龊”和“不足群”。此时的李白还没有经历人生中的重要起伏,在他身上只有对自己高度的期许。故而在李白的早期诗歌中,陶渊明只是作为隐居意象出现,并未附加什么深刻的含义,如《题东溪公幽居》:

杜陵贤人清且廉,东溪卜筑岁将淹。宅近青山同谢眺,门垂碧柳似陶潜。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客至但知留一醉,盘中祇有水精盐。

又如《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

化城若化出,金榜天宫开。疑是海上云,飞空结楼台。升公湖上秀,粲然有辩才。济人不利己,立俗无嫌猜。了见水中月,青莲出尘埃。闲居清风亭,左右清风来。当暑阴广殿,太阳为裴回。茗酌待幽客,珍盘荐凋梅。飞文何洒落,万象为之摧。

季父拥鸣琴，德声布云雷。虽游道林室，亦举陶潜杯。清乐动诸天，长松自吟哀。留欢若可尽，劫石乃成灰。

当李白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起落后，陶渊明就成为其诗歌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来源，《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细致地描绘了安史之乱中急急如丧家之犬的李白，愿意“且学南山豹”归隐求安，诗歌的最后说“华髮长折腰，将贻陶公诮”^{[7]637}则是对其早年妄自尊大的反省。李白这样的诗歌很多，如《赠临洛县令皓弟》《别中都明府兄》《山人劝酒》《戏赠郑溧阳》《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江上答崔宣城》《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等。在这些诗歌中，陶渊明都成为李白歆慕的对象，如《戏赠郑溧阳》：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陶渊明成为李白精神寄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陶潜所描写的桃源仙境。桃源理想自卢照邻引入唐诗后，就成为唐人的一处精神家园。李白有入道求仙的经历，他在《秋夕书怀》中表达了自己隐居桃源的愿望：“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7]1116} 求取长生是诗人最直接的动力，桃花源的理想世界对他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在他外出求仕失败的时候，桃花源能够为他提供精神的归宿，如《山人劝酒》中的仙境描写：

苍苍云松，落落绮皓。春风尔来为阿谁？蝴蝶忽然满芳草。秀眉霜雪颜桃花，骨青髓绿长美好。称是秦时避世人，劝酒相欢不知老。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欵起佐太子，汉王乃复惊。顾谓戚夫人，彼翁羽翼成。归来商山下，泛若云无情。举觞酬巢由，洗耳何独清。浩歌望嵩岳，意气还相倾。

再如《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作者已化身仙人归去桃源：

学道三十春，自言羲和人。轩盖宛若梦，云松长相亲。偶将二公合，复与三山邻。喜结海上契，自为天外宾。鸾翮我先铄，龙性君莫驯。朴散不尚古，时讹皆失真。勿踏荒溪坡，竭来浩然津。薜带何辞楚，桃源堪避秦。世迫且离别，心在期隐沦。酬赠非炯诫，永言铭佩绅。

《江上答崔宣城》中陶渊明已在西岳得道，并指点作者求仙的法门：

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寻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问我将何事，湍波历几重。貂裘非季子，

鹤氅似王恭。谬忝燕台召，而陪郭隗踪。水流知入海，云去或从龙。树绕芦洲月，山鸣鹊镇钟。还期如可访，台岭荫长松。

同时，李白因其晚年常常要依附某些县令以获得资助，为了奉迎官员，他常以陶潜比拟他们。所以其笔下的陶渊明就具有了良吏的性质，这也是唐代陶渊明接受史中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盛唐诗坛受陶渊明影响最深的诗人非杜甫莫属。他在诗歌中大量使用陶诗典故，并且仿效陶诗创作了不少山水田园之作。他的《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秋尽》《可惜》《遣兴五首》(其三)都直接与陶渊明有关。其中争议最大的当属《遣兴五首》(其三)：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着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杜甫能够从陶潜的诗集中看出他“颇亦恨枯槁”，朱熹由此而生发出“金刚怒目”的评价，可见杜甫对陶渊明的理解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能够发人所未见。那么杜甫为何还要批评陶渊明“未必能达道”呢？从杜甫的经历来看，他身逢丧乱，漂泊伶仃，对于世事变化最有感悟，能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已属难得，又怎敢奢望其他。黄庭坚认为这是杜甫的自嘲之语，是借助陶渊明来纾解胸中块垒：“子美困顿于三川，盖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聊解嘲耳。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俗人便谓讥议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11]209} 正是出于对身处乱世的陶潜故作戏谑的同情，杜甫才能写下这首同样含有自嘲意味的诗来，正像两个神交已久的老友在互相打趣一般，实在是苦中作乐罢了。杜甫对陶渊明的理解代表了唐代陶渊明接受史中最为客观公正的观点，从命运无常的角度揭示陶潜之于乱世求生者的意义。由此可见，正是盛唐诗人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导致了他们在接受陶渊明时不同的关注点，并由此在其自身的诗歌创作中生发出了对陶渊明形象的不同理解。

3 中晚唐时期：田园情趣的世俗化倾向

唐人接受陶渊明的途径除了史传的各类记载及《文选》《陶渊明集》等文学文本外，主要通过各种类书的征引，诸如朝廷编撰的《艺文类聚》《初学记》等都收录其诗文，中晚唐私人编纂的类书同样如此。总体而言，官方编纂的类书的内容和条目更为详

备,而私人编纂的类书则稍显简略,但更能看出作私修类书中对陶渊明的征引进行对比,如表1所示者的用意所在。兹以初、中、晚唐不同时期的官修、私修类书中对陶渊明的征引进行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初、中、晚唐不同时期的官修、私修类书中对陶渊明的征引对比表

《艺文类聚》	《白氏六帖事类集》	《岁华纪丽》
“九月九日”条“《续晋阳秋》曰: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12]148}	卷一“九月九日第五十”条“白衣菊酒”引“《晋阳秋》曰:陶潜九月九日无酒,宅边摘菊盈把,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便饮醉而归。” ^{[13]72}	卷一“二月”条“雷鸣东隅”引陶潜诗:“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14]23}
“友悌”条选陶潜《祭从弟文》	卷十二“弃官第二十八”条“归去来”引“陶潜为彭泽令,曰:今日不能为五斗粟折腰于乡里小儿。乃弃官作《归去来》。” ^{[13]514}	卷二“夏”条“荣木之诗”引陶潜《荣木诗》
“鉴戒”条选陶潜《诫子书》	卷十二“弃官第二十八”条“解咏咏风”引陶潜事。 ^{[13]514}	卷三“秋”条“南霄之度征雁”引陶潜秋诗:“哀蝉无留响,征雁鸣南霄。” ^{[14]72}
“行旅”条选陶潜《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	卷十八“琴第十四”条“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引曰:“陶潜不解琴,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曰云云。” ^{[13]514}	卷三“霜”条“珍异类”陶潜诗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混其奇。晨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 ^{[14]84}
“贫”条选陶潜《贫士诗》	卷十八“笛第二十五”条“清哀”引陶潜《闲居赋》曰:“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以素阶。鸡敛翼而未鸣,笛出声而清哀。” ^{[13]740}	卷三“月”条“出东陵”引陶潜诗:“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 ^{[14]86}
“隐逸”条选陶潜《归去来》、《张长公替》	卷七“隐逸第十四”条“慕山林之操”引曰:“晋陶潜,字渊明。少慕山林之操,志行高洁,退居山林,以琴酒自娱。” ^{[13]751}	卷三“重阳”条“白衣酒”引“《晋阳秋》曰:陶潜无酒,坐宅边菊丛中,采摘盈把,望见王弘遣送酒,即便就酌”;“菊制龄”引陶渊明诗:“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 ^{[14]96}
“祭祀”条选陶潜《自祭文》	卷二十一“县令第七十六”条“彭泽柳”引曰:“陶潜,字渊明。为彭泽令,门种五柳。” ^{[13]295}	
“读书”条选陶潜《读山海经诗》	卷二十一“县令第七十六”条“归去来”引曰:“晋陶潜渊明为彭泽令,州使椽来。吏曰:当迎。潜曰: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乃咏《归去来》,遂纳印弃官而归。” ^{[13]874}	
“史传”条选陶潜《咏荆轲诗》		
“田”条选陶潜《杂诗》“种豆南山下” ^{[12]148}	卷二十三“公田第十八”条“种秫”引曰:“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种秫。曰:令吾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秬,乃使三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秬。” ^{[13]877}	
“园”条选陶潜《杂诗》“开荒南野际” ^{[12]1743}		
“巾帽”条选《宋书·陶潜传》:“陶潜在家,每酒熟即以头上葛巾漉酒,毕复裹之。” ^{[12]1746}	卷四“冠弁冕第三”条“漉酒”引曰:“陶潜在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 ^{[13]910}	
“酒”条选陶潜《饮酒诗》“既醉之后” ^{[12]1783}	卷五“酒第一”条“种秫”引曰:“陶潜为彭泽令,县公田尽种秫。” ^{[13]168}	
“菊”条:“《续晋阳秋》曰:陶潜无酒,坐宅边菊丛中,采摘盈把,望见王弘遣送酒,即便就酌。” ^{[12]1870}		
“桃”条引陶渊明《桃花源记》		
“杨柳”条“陶潜曰: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因以为号。” ^{[12]2083}	卷七“隐逸第十四”条“五柳”引曰:“陶潜《五柳》。” ^{[13]201} 卷三十“柳第二十七”条“五柳先生”引“《晋书》:陶潜字渊明,为彭泽令,宅边栽五株柳,自号为五柳先生。” ^{[13]296}	

从表 1 可知,类书征引内容的重复性很高,主要集中在“酒”“九月九日”“重阳”“菊”“柳”等意象上,说明唐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确立了较为固定的基本印象。因此盛唐人每于九日诗中称引渊明,且与饮酒、菊花联系,如崔国辅《九日》、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王昌龄《九日登高》、刘昫《九日送人》、高适《九月九日酬颜少府》及《重阳》、杜甫《九日杨奉先会白水明府》及《复愁十二首》(其十一)、张均《九日巴丘登高》、孟浩然《卢明府九日岷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等都是如此。这说明,唐代诗人在引用与陶渊明有关材料时受到这些类书的影响很大,他们不需查阅陶诗的原文,更不用深究其原意,直接从类书中摘引诗文或重新改写,这或许是唐代对陶渊明思想接受并不深刻的原因之一。诸如《形影神》这类能够反映陶渊明哲学思考、探索人生终极意义的诗歌之所以未能普遍进入到唐人接受视野内,正是因为这类作品难以被类书归类吸收。

相较于初盛唐诗人,中晚唐诗人对陶渊明的理解偏向于田园情趣的抒发。中唐人更关注于陶渊明的隐逸闲趣,并把这种隐逸情趣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反思改造为普遍化、世俗化的闲情雅致,从田园走向官衙,将理想引入世俗。由此,隐逸超越外部形迹,进一步向心灵过渡,成为超越出处行藏,不避世俗的闲适之情。这在韦应物、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大历十才子中崔峒的《题桐庐李明府官舍》便是此类作品,刘长卿的《送金昌宗归钱塘》也表现了相同的艺术追求。中唐时期学陶最为成功的还属柳宗元,其诗文对陶渊明的继承最为明显,但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佛教,而非魏晋玄学,故而二者在诗歌精神归属的层面仍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中唐时期的诗人以更为明确和理性的思辨发现了陶诗的志趣,特别是皎然在《诗式》《诗古文联句》中运用当时的诗学观点对陶诗的艺术特点、艺术价值进行了发掘,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陶诗在诗史上非同寻常的地位。而晚唐诗人则因唐末大乱的现实因素进而推崇陶渊明的为人,甚至有将陶渊明理想化的倾向。他们较为普遍地肯定了陶诗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创作实践中对陶诗的情趣、风格多有效仿和借鉴。这一时期仿作陶诗者甚众,如黄滔《赠郑明府》《木芙蓉》(其二)、李德裕《海鱼骨》、李

频《送罗著作两浙按狱》、李群玉《请告南归留别同馆中元作》等。然而,这些作品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不愿过多地讨论陶渊明隐居的政治原因。从这一时期的类书征引情况可以看出,除了李商隐、杜牧等大诗人外,一般诗人主要在词句上接受陶渊明的影响,诗文缺少宏阔的格局和深邃的思考,产生了境界狭小,沉溺声色的缺憾。

4 结 语

综上所述,唐代陶渊明接受史具有历时性变化的特点,不同时期的不同文人根据时代背景和个人境况扬弃式地接受陶渊明的影响,这使得唐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携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唐代诗人对陶渊明怀有褒贬共存的复杂感情,这与其处理仕与隐的矛盾有关。同时,由于唐人大多通过类书等形式接受陶渊明,造成了对陶渊明的理解不深的弊病,故而创作了大量题材单一、内容类似的诗文,此类情形的改善有赖于大诗人对陶渊明的深入挖掘,以及诗话评点类书籍的流行。

参考文献

- [1]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清]严可均, 全隋文[G]//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3] 张沛. 中说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4] [清]蒋清翊. 王子安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5] [唐]卢照邻, 杨炯. 卢照邻集杨炯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6] [清]董诰.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7] [唐]李白. 李太白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8] 萧涤非. 杜甫全集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9] 陈铁民. 王维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0] [清]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1]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2] [唐]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13] [唐]白居易. 白氏六帖事类集[M]. 台北: 新兴书局出版公司, 1975.
- [14] [唐]韩偓. 岁华纪丽[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